

達縣文史資料

第 四 輯

四川省達縣政協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印

达县文史资料

四川省达县政协 编印

达川市印刷厂 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7 字数156千

准印证号：达县(94)字第017号

工本费：5.50元

前 言

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政协和省政协的指导下，我会自1980年恢复以来，先后共征集到各类文史资料近160余万字。1986年选编了《达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约11万字，印4000册。1988年选编了第二辑，约15万字，印2000册。1990年选编了第三辑，约14万字，印1500册。以上三辑主要内容是1911年至1949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等方面的情况回顾和介绍。现在，我会又选编了第四辑，即将付梓。

第四辑《达县文史资料》共选刊了文史稿件30篇，计七万字，印1000册。其内容比较庞杂，主要是对以上三辑有关内容的补充。有少数文稿涉及到了1949年至1957年间有关土改、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方面的内容。

《达县文史资料》能连续成书，是和县委、人大、政府的指导和社会上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支持分不开的。在此，我会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低，业务能力差，文中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敬请批评斧正！

编者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四日

主 编 罗丕林

编 辑 寇兴华 常龙云

封面题字 魏传统

封面设计 龙清武

校 对 贾本瑜

目 录

邓小平同志和我们一块做游戏·····	李美安 (1)
回忆贺龙元帅领唱《五星红旗》·····	李美安 (5)
记胡跃邦同志的几次趣谈·····	李美安 (7)
悠悠故人情——回忆战友王长德同志·····	李开芬 (9)
忆赴国难投延安·····	曹文初 (14)
雏鹰展翅幼马飞奔——原唐山部队部 分同志回忆达县知识青年首批参 军等情况·····	欧绪森、李富通、朱忠厚执笔 (29)
红军在石桥留下的标语·····	潘广俊 (39)
达县文宣·····	赵坤儒 [冯通衢] (41)
土改中我与贺志华接触的二三事·····	杨先国 (44)
回忆罗希仁老师·····	吴万才 (50)
忆王寿民先生·····	悟 实 (55)
解放前汉渝路的修建概况·····	陈庭礼 (63)
通川桥·····	陈庭礼 (66)
金元券、银元券在达县的流通概况·····	王邦福 (69)
抗战时期达县粮食营运·····	朱肇全 (72)
渠江盐务概况·····	朱肇全 (77)
达县解放后建立的一个“特殊”工厂·····	郑贤德 (82)
达县明月江流域“五二·九”洪灾及 其治水方略的回顾·····	郑贤德 (84)
石桥镇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的抗统斗争·····	郑贤德 (87)
李长祥与姚淑·····	赵开宗 (90)

由“元九”登高谈一点元九其人·····	郑承教	(93)
周蜀云·····	李富达	(96)
我所知道的黄连城·····	梁警庵	(99)
青年军及其纪律·····	王尧忠供稿 王元整理	(102)
达县“一贯道”概况·····	章文仪	(105)
民国年间达县的“一贯道”·····	杨奉禄	(109)
三善堂帝国主义分子罪行录及接管简况·····	张常忠	(111)
大刀会在赵家·····	何达才 黄孝吉	(113)
刀儿教在兴修明星水库的暴动未遂事件·····	郑贤德	(115)
洪毅然年表·····	吴 芸	(118)

邓小平同志和我们一起做游戏

李美安

1952年盛夏，山城热得象着了火似的，驻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后院却林阴凉爽。在这里，我们数十名20岁上下的年青人，身穿一色的灰布制服，人人坐一小方竹凳围成几个圆圈各做各的游戏。

这是军政委员会分赴到康（原西康省，1956年合入四川）、滇、黔等省剿匪平叛的机要译电员临行前的一次娱乐活动。活动刚开始，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同志一下起身，快活得象孩子般手舞足蹈地叫道：“邓政委来了！邓政委来了！”我们闻声一齐起立。果然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刘、邓大军）的政委兼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偕同夫人卓琳同志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地向我们走来了。

与邓小平同志同行的还有军政委员会机要处魏处长，他们三人谈笑风生地走近了我们。小平同志摘下灰布圆帽，在手上摆动着当先跨进了院门。我们停止了游戏活动，都争着拥向小平同志。这时，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小女同志仍在往前使劲的挤，嘴里抱怨前面挡着她的人：

“是哪个嘛？是哪个嘛？”。小平同志看到了她，走过去给她戴正挤歪了的灰布圆帽，诙谐地说道：“不追究是哪个了”。小女同志甜甜地、不好意思地笑了。卓琳同志也走过去，一只手亲切地搭在她的肩上，贴近她耳边说着悄

悄话……

“小同志们！”邓小平同志声音宏亮地对我们讲：“你们年轻少少的就到达区剿匪平叛，完成解放大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使命，任务是很光荣的！你们是机要译电员，中央和我这里的党政军的重要机要电报都是你们翻译。这样的机密一有失密，就是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军队、一场战役、一次战斗的大祸！保守党的机密是机要人员的第一生命……”接着他又转换语气，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坐下！都坐下！我也是来参加做游戏的。”我们不约而同地由原坐成的几个小圆圈改坐成了一个大圆圈。我紧挨着小平同志而坐，心里很高兴。卓琳同志和那位齐耳短发的小女同志相挨而坐。

都坐好了后，民主推荐一人“蒙猫（用手巾将双眼蒙着）摸人”从摸着的人顺右数18罗汉，从数到的第18人，开始做游戏，前一个做一种游戏，后一个模仿着做，做不起的为输，做不标准的重做，三次不达标者定输，输者受罚。这样做到最后的一人，又从倒数18人开始第二轮。小平同志强调说：“要输得起，输了不服罚就再罚，再罚不服，要加罚。”大家说“要得”。

游戏开始后，输了，有演唱苏联卫国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战歌的；有唱《二郎山》、《康定情歌》和《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有单人跳红军舞、交谊舞、青年舞、秧歌舞的；有说单口相声、评书、表演《水浒》中的时迁上房瓦不响的；有学鸡叫、狗叫和猫儿叫的。还有很多滑稽有趣的表演，满场笑声和啦啦队声时起时落。

游戏做到小平同志名下了，他一手搭在口唇上，吹出

几种声音，并且对我说：“请你照我这样做”。我全做不起，只好红着脸挨罚。他不了解我，便征求大家的意见罚什么节目。有人早就笑我排队报数报“二”报不明，要我站到大圆圈之中一人排队报数“一、二”。小平同志提出，他是执行罚官，由他规定X时间内报数一二X次。我暗想，不外乎搞得我越报得快越报不明，大家趣笑而已。于是，我一个人站在圆圈中开始报数。我越报越快，越报越不明，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小平同志在大家还未停止趣笑时，率先鼓掌鼓励我超额完成任务，大家也跟着鼓起掌来。小平同志笑着说：“我这个执行罚官带头欢迎你在X时间内单数二X次。”大家又是一阵欢笑。我稳起，小平同志又幽默地对我说：“小同志，服罚是输得起，欢迎你单数“二”是大家的抬举哟！”我口齿不清地快速数着二，究竟数了多少个二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大家越发笑得快活了。卓琳同志也笑了。小平同志稳不住笑，向大家报告了结果。我过关了，一下轻松了起来。

倒数第二轮，我便在小平同志之前，游戏做到了我名下，我双手伸出，两根大指母一齐屯成前后各成两个直角。我对小平同志说：“请你照我这样做。”他全做不起。我罚他唱一首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战斗歌曲，并欢迎卓琳同志打拍子。他俩齐声道：“执行罚官不公道，这是株连。”我胸有成竹地回答：“我欢迎卓琳同志打拍子，不是罚她，怎么是株连呢？”卓琳同志在一片掌声中笑容满面地起身入场打了拍子。

邓小平同志唱起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万里风雪盖哟高原哟呵呵！”我们齐唱：“盖哟高原哟呵呵！”（二部轮唱），小平同志接着唱道：“大渡河水浪

滔天！”我们齐唱：“嘿哟呵！”（二部轮唱）我们同小平同志合唱：“进军的道路被它拦，进军的道路被它拦……”卓琳同志成了我们合唱、轮唱的总指挥。大家越唱越起劲，越唱越激动，真有气壮山河的气概……

回忆贺龙元帅领唱《五星红旗》

李美安

1951年，我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机要译电班学习。学习班设在解放前的中共西南局机关驻地的重庆红岩村，对外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三部一班。

1951年10月1日，是我们共和国诞生的第二个国庆节，山城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机要人员不能上街游行。因此，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处，用几部专车将我们100多个20岁上下的学员，接到机关欢度国庆。到那里，首先把我们带到安排好的庭院，跳“青年舞”、做游戏。活动了一会，院门前，机要处魏处长与贺龙同志同行而来。处长上前几步对我们说：“贺司令员看你们来了！”元帅走近我们，他一手摸着他那浓密的胡子，对我们玩趣地说：

“我贺胡子来和大家一起做游戏，欢迎吗？”我们齐声应道：“欢迎！”元帅动身走了几步又说：“今天是国庆日，先唱首《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都会唱吗？”我们齐声回道：“会唱！”元帅笑着说：“我就当领唱啊。”

元帅起音，我们齐声唱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100多双眼睛，望着军政委员会大院上空高高飘扬的国旗……；“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我们感到元帅和我们的合唱，歌声响彻大西南每个城镇和村庄。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的心融进山城下昼夜奔腾的万里长江。我们在歌声中手拉手涌到元帅身旁当唱道

“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时，我们的脸变得忧郁，回想起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悲凉；“我们战胜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捏紧拳头，歌声更加宏亮。

元帅啊！当我们想到您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身亡的情景，愤怒之情久久难以平静，您的革命业绩，一直鼓励着我们奋进。

元帅，安息！

记胡跃邦同志的几次趣谈

李美安

1951年春初，我从达县地委抽调到川北行署（解放初军管时期的省级区划地区，治地南充）土改试点培训班学习。开学前，在行署大礼堂听学习动员报告。胡跃邦同志（那时他任川北行署主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于百忙中抽身到场给我们讲话。当他讲到认真学好土改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总方针时，强调团结中农是执行好总方针的一朵花，土改任务完成了，花没有开好就不好看。我们笑起来了，这句话在我们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至今还记忆犹新。

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土改培训班的学员和行署的干部一起集合到南充广场开庆祝大会。胡跃邦同志在主席台作报告。在讲到抗美援朝，批判那时的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时，他说：“有人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难打败美国军队，事实上我们一开战就克敌制胜。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对中国进行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的美国佬，看到农民大便后用青草擦屁股，觉得很卫生、方便、科学，于是也这样做，却抓到藿麻（有刺无形的野草），刺着屁股，痛得乱跳怪叫，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草咬人呢？在场的农民无不得意地笑道，是神草，不咬我们，专咬侵略者。洋人呆着不语。洋人并不比我们怎样。我们何必要盲目地

无国格地崇美、亲美、恐美？”他停顿下来，数万人的笑声响彻了大会场。

土改结束后，我们在达县师范学校（今达师专）开扩干会。会期中，川北行署副主任刘巨述（又是当时川北土改总团副团长兼任第二分团，即达县团团长），达县地委范敏书记等首长和跃邦同志同行，到我们正在开饭的食堂来了，关心土改工作队员的伙食好坏。那时用的大木甑子蒸饭，汤菜合一，一桌一盆，我们称为“解放菜”。跃邦同志走到大木甑子边，亲自给一个一个土改队员添饭，还说，“解放菜真香啊！我接过添给的满满一碗白米饭时，跃邦同志学着我们四川人的腔调，对我趣笑道：“吃了又来哟！”逗得我们都笑了起来。

悠悠故人情

——回忆战友王长德同志

李开芬

这些年来，我时常感到自己在回忆中生活。虽然，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冲淡和埋葬了许多记忆。但有些事情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其中有我和长德的生死情谊……

最初印象

1933年冬，川陕苏区的大地上出现了不祥的阴云，“肃反”扩大化运动遍及每一个角落。当时我刚入伍不久，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感到迷惑不解，每天都有些同志被拉出去杀害！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而英勇地倒在自己同志的刀口之下。我恐惧，我不安，但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在这场政治漩涡中险些毙命。在一次党团员大会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指控为“反革命”，并将送往革命法庭。幸亏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赶来阻止。自此之后，“肃反对象”这顶帽子牢牢扣在我头上，它成为我精神上的沉重包袱。

第二年春天，达县县委领导同志为了把我保护起来，让我和几位有“肃反”嫌疑的小姐妹一起住进了医院，编在川陕工农总医院第八连。连长王长德，是个小个子。正直、爽朗、热情、泼辣，典型的四川姑娘性格，病友们都

称她为“连长姐姐”。

刚进医院时我们都没有病，但由于精神上过度紧张和压抑，又成天生活在病人之中，没有过几天我们果真染上了伤寒！一个个发起高烧，说起胡话来。尽管如此，保卫干部仍未停止对我的审讯。一天深夜，他们闯进病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恶狠狠地问：“你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不说就把你拉出去！”说着还想动手。连长闻声赶来，只见她两手叉腰，怒目圆睁，“你们想干什么？她是我的病人，绝不许你们动一根汗毛！”这时，病友们围上来，都用责备的眼光盯着他们，他们一看众怒难犯，便无可奈何地走了。这时，两行热泪止不住从我眼眶里滚了出来。

手足情深

随着形势一天天紧张，“肃反”的气氛也越来越浓了。几乎每天都有同志被拉出去。我们几个小姑娘整日整日地提心吊胆，躲在被窝里暗暗啜泣。由于精神上的沉重压力，我们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同来的几位小姐妹先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王连长害怕我也死去，便让我搬到连部去住，天天为我熬药、喂饭、梳洗，像亲姐姐似地关心和照料着我。在她的精心护理下，我的病渐渐有了好转，终于能下地走路了！我对王连长充满了感激之情，把我的委屈一古脑地倾吐出来，她耐心地劝慰我，她说她是个穷孩子，没有念过书，想让我教她认字。这有什么可推却的吗？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此后，我天天教她识字，木棍、筷子、石灰块，都是我们的学习用具。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又度过了几个月，她以

欢乐的笑声感染了我周围的许多人。在这种气氛中我的精神虽然轻松了许多，但怎么也笑不出声来，因为我仍是那个低人几等的“肃反对象”。王连长注意到我的情绪，时常逗我说话，谑称我为“小哑巴”、“小尼姑”，并想方设法保护我的自尊心。一次，她见我用手搓脸，一把夺过扔在地上，劈头盖脑地问：“谁说脸白就是知识分子，谁说皮肤嫩就是不革命？都是屁话，你不要听！”为了使我早日恢复健康，她不知从哪弄来了狗肉让我补养身体。我的病痊愈后，她反复叮咛我说：“去学医吧！可以少担些风险！”

共 苦 同 甘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紧张的环境中，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处境非常困难，最发愁的是粮食，有时几天吃不上一口饭。一天，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正准备回医院，突然有人用双手蒙住我的双眼，我扳开她的手看，哎呀，是王长德！她告诉我要过雪山草地，要我做好思想准备，并给我一双布草鞋。我拿出为她准备的干粮，花椒盐和一副墨镜。她惊讶地问：“啊，这么多好东西，从哪弄来的？”我悄悄告诉她是用医院发的几块大洋买的。这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她常向周围的人们提起这件事：“那副墨镜和花椒盐还真管用，没有它，我也许就过不来了。”的确，过雪山时有不少人得了雪盲病，更多的战友因饥饿和寒冷长眠在雪山草地。

在延安，我进抗大学了几个月的后，到抗大医院工作。她在抗大编辑部工作，见面的机会增多了。1939年